

导读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人才、数字建设等一道构成国家软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指明了战略方向和实践要求。

本期《理论·智库》邀请专家学者围绕文化输出、人才培养、数字金融等方面展开,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 讲好中国故事

王润华

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外语教育承担着增进跨国别、跨文化理解的使命和责任,理应发挥语言学科优势,将中国文化不断融入其中,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做好顶层设计,确定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新目标

当前,我们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华民族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亟待培养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和精通国际谈判”的新时代外语人才。高校外语教育应结合外语教学特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中国立场,厚植家国情怀,加强文化浸润,注重系统推进,确保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有机统一,确保思想道德培养与专业知识学习同向同行,努力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时代新形势下,外语教育目标应

由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向与对外传播中国并重转变。除继续坚持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外,外语教育应该以加强学生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为新目标、新任务,培养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具备高超的外语能力及国际传播能力,能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时代新人。

开展师资培训,明确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核心任务

如何发挥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关键在教师。针对非传播学教师普遍缺乏传播学理论学习和实践的现状,建议开启外语教师传播能力培训专项计划,使外语教师了解、熟悉传播学基本理论、传播手段及国际传播机制,提升传播等跨学科综合素养,践行外语教育教学中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

提升外语能力,搭建国际传播语言桥梁。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外语教育应培养学生扎实过硬的外语运用能力。尤其要引导学生了解对象国不同的思维方式,用符合目标语思维方式的语言,与国外受众进行交流,为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储备好语言能力。

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丰富对外传播内容。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推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开设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专题、国情省情讨论等课

程,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湖湘文化的理解,能够向世界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伟力和精神力量,阐释好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

了解国际传播规律,提高国际传播效果。开设高级演讲、高级口语等课程,帮助学生树立国际传播受众意识,用目标受众能理解、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根据对象国受众特点、习惯,正确选择有效的传播方式,增强国际传播实效性。

开展大量实践,提升学生国际传播实战能力

国际传播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鼓励他们多实践,努力做到“做中学”,是提升能力的有效法宝。让学生不仅知中国、爱中国,更愿意讲中国,愿意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利用好实践课程。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青年接受信息、传播信息的主渠道。根据青年的兴趣、爱好、特点,教师可以在专业实习、口语实习等实践课中布置传播任务,以任务为导向,开展教学活动,启发学生以中国真实故事为蓝本,以有温度、符合海外受众认知特点与习惯的视频故事为载体,用外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文化地标,积累传统文

化内涵;到媒体进行参访调研,了解智能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新趋势;鼓励学生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线上还是线下,积极主动全方位开展国际传播实践,如利用国外社交平台分享小故事,科普中国民俗等,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利用社会资源,拓展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渠道

跨学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社会资源的助力。在培养学生国际传播能力方面,除了学校资源,应广泛利用社会、企业资源,拓展人才培养渠道,实现多主体协同育人。

首先,开展校企合作。鼓励学生走进新闻媒体、国际传播媒体机构、企业实习,实际参与国际传播实务实操;其次,参与项目建设。在产学研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创新表达,可聘请行业一线的媒体专家担任指导老师,进行全程辅导。同时,广交会、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对外交流活动、平台,可为学生开设专门的志愿服务渠道。总之,外语教育要广泛利用学校、社会、企业资源,实现多主体、多渠道协同育人,使学生成长为符合行业要求,满足社会需求的国际型传播人才,为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添砖加瓦。

(作者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湖南省翻译协会理事)

提升跨文化能力 助力开放崛起

杨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老教授代表回信中指出,新时代外语教育目标是“努力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能适应文化多样性要求、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背景人群、有跨文化能力的年青一代,已成为当前高等外语教育的迫切任务。立足湖南,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我省外语教育必须紧跟湖南“走出去”的步伐,培养跨文化能力突出、有专业本领、有家国情怀的复合型人才,助力全省开放崛起大局。

围绕“开放”,锻造跨文化交流能力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湖南考察调研,为湖南擘画了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蓝图。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湖南将深入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建设,构建更加完善的对外开放支撑体系,推动高水平引进来走出去”。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新的对外开

放格局,是湖南省委、省政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战略举措。与此同时,湖南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也给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高质量国际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对加强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提升湘企国际竞争力,助推我省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大局是高校的重要使命,具体到外语教育,也应该围绕国家、区域的战略布局,培养出跨文化能力强的国际型外语人才。应当充分利用“长江—伏尔加青年论坛”等已经开展的各项论坛、活动,提高青年学子跨文化交流能力,高层次的交流互通能为今后的合作打下良好基础;建议在湘建立相关国家语言中心,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语言服务及国情咨询,将学生实践与本地经贸活动结合起来,在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同时,也为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引导学生转变就业思路,以开放的视野发挥外语特色,大力支持学生“双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

我省经济发展。

聚焦重点,助力发挥地区优势

立足“十四五”规划、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我省产业发展重点已经发生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更不可小觑。目前,中国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的最大游客客源国,湖南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独特,民俗文化多样,吸引了不少海内外游客,旅游逐渐成为湖南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跨文化能力突出的外语人才培养是促进我省出入境旅游服务行业发展,提高竞争力,促进来湘旅游、湖南人境外游的有力保障。

文旅可以成为跨文化交流人才的重点服务领域。加大外语专业学生对文旅的兴趣培养,让他们深入了解湖南的文化渊源、美景美食、红色文化、红色故事,熟知中外友好历史故事,亲身体验湖南地方特色民俗文化;支持国际旅游产品出海,针对其他文化背景对象进行精准投放、推广,助力湖南文旅产业发展,提升外语人才服务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深度和高度。

多措并举推动湖湘文化典籍翻译与传播

胡芳毅 李海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新时代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指明了方向。

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将蕴含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典籍翻译出去,能极大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文化由各种各样的地域文化组成,强调“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是其中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地域文化之一。将湖湘文化典籍传播到海外,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湖湘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和传播还缺乏系统性,许多优秀湖湘文化典籍还没有翻译、传播到国外。多措并举,推动湖湘文化典籍在世界范围内的系统翻译和传播,成为时代亟需。



划分批次地翻译到国外。第一步要“择当译之本”,确保翻译选材的质量,外译的湖湘文化典籍要能够真正代表优秀的中国文化及湖湘文化,选材过程需要湖湘文化研究专家参与;翻译选材可以借鉴《大中华文库》的经验,建议由相关文化部门牵头组织,成立“湖湘文化典籍翻译委员会”,确保翻译选材重质量、有计划、成体系,避免盲目和重复。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精选优秀译者;翻译模式采取中外译者合作的模式,这方面已有杨宪益夫妇、葛浩文夫妇等成功的例子,中国译者在理解原文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外国译者在译文表达方面的天然优势不可替代,可以确保译文通达,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

加强译本的宣传推广工作,使翻译价值最大化,做好译本的海外传播推广尤为重要。译本的宣传推广工作是一项

系统工程。翻译工作,尽量与具有世界声誉的译者合作,请他们参与作品的翻译,译者的影响力对于译本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出版工作,最好由目标语国家中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它们熟悉本地的情况,可以有的放矢地做好湖湘文化典籍译本的本地化工作,另一方面,国外读者对于自己熟悉的、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出版的译本认可度更高,这样的译本可以更快、更广地打开市场;推广阶段,出版商可以通过报刊、杂志、网络媒体及微信等社交媒体广而告之,组织专家学者在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书评、组织读者开展读书书评活动、组织召开译本发布会、组织译本参加大型国际书展等。总之,通过出版商、译者、专家学者、读者的联动合作,借助各类媒体、各种活动,对湖湘文化典籍译本进行立体的宣传和推广,有利于提升译本的接受程度和传播效果。

(作者均系湖南省“湖湘典籍翻译与传播”社科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抓好“三进” 培养新时代外语人才

戴可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是外语类高校立德树人、培养一流外语人才方阵的根本之举,对培养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意义重大。抓好“三进”,既是高等外语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基础,也是培养心怀“国之大者”、担当复兴大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举措。

推进“三进”工作是坚定师生理想信念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契机,对高校外语教育来说极其重要。高等外语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必须是“会语言”“通规则”“精领域”的卓越国际化人才,必须是心怀“国之大者”,能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年一代,既要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和民族自信,又充分知晓和尊重外国文学文化,致力于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高等外语教育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研判、准确识变、把握方向。在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大势下,外语教育战线应该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国际话语体系作出应有贡献。

“悟道才能进入化境。”“三进”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明晰了外语教育的工作方向和思路。抓好“三进”工作,是落实好课程思政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抓住了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融入。

融入外语教师日常学习全过程。高校外语教师坚持思政引领、落实立德树人,就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提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三进”工作的认识,结合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践行课程思政,成为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融入外语高校党建工作全程。外语高校要准确把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多语种版本“三进”工作的内涵和要求,力行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建立健全各部门协同配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于人才培养全过程,抓住课堂教学主渠道,探究外语教师与思政教师互动交流;通过班团建设活动、学生党支部建设、暑期社会实践、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推进“三进”,形成三全育人的良好局面。

融入外语专业教材体系建设。“三进”试点过程中,有关高校已组织编写了一批高水平教材、讲义和教辅资料。学习、借鉴这批最新的教材,探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外语教材中的呈现方式,开展教材研读,编写教学大纲,设计教学案例,推出高水平教改成果。支持师生开展课程研究、教改研究、创新创业等专项建设,打造一批育人效果显著的“三进”项目,不断丰富教材内容。

融入外语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将知识、技能、思辨和价值观引领融为一体,在思政引领中凝聚专业知识,在专业教学中凸显价值追求,是“三进”的重中之重。以往,翻译理论课堂重在翻译理论和技巧讲授,可以转变为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原著与多语种版本的语篇对比分析入手,实现从原语到目标语、再从目标语到原语的双向学习;口译课程,则可以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双语研读为基础开展翻译能力训练;其他课程,紧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内容,以专题的方式融入课堂教学,以此实现人才培养的思想意识重造,教学流程重塑,教育体系重构。

抓好“三进”,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外语课程研究和人才培养全过程,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三进”工作的认识,结合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践行课程思政,成为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作者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把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国家竞争力新引擎

陈莉妍 陈长里

数字人民币是一次货币革命,中国研发、发行的数字人民币“一骑绝尘”,取得先发优势,并在国内多地试点,扩大应用场景,取得了良好效果。北京冬奥会期间,数字人民币全面覆盖食、住、行、游、购、娱、医七大重要消费场景,其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获得国内外一致好评。

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数字人民币除像实物货币一样能够承担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四种职能外,还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安全稳定性强等核心特点,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有效地保障交易安全与稳定。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具有价值特征和无限法偿性的可控匿名的法定数字货币(DC/EP)。与私人数字货币相比,我国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具有国家信用作支撑的天然优势,能够通过货币政策等调节机制实现数字货币币值的稳定性。而且,在流通领域,数字人民币每次网络交易时由众多节点确认及记录所有交易行为,伪造和篡改任何一笔交易几乎不可能,大大提高了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安全性。

切实保护个人隐私权。去身份化是数字人民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数字人民币采用匿名式、分布式的电子加密方法,其交易依靠公私密钥和数字证书的验证来确定交易双方信息。央行通过可控匿名性来实现保护公民隐私权和维护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

有效打击洗钱、逃税、恐怖融资等违法行为。数字人民币采取可控匿名机制,掌握用户的全部信息、交易的全程记录和货币流通的全面过程,能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逃税等行为。

推动精准金融。根据数字人民币可追溯特性,掌握数字人民币的运行和金融账户情况,以便央行实行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模式转变的利率政策,对不同的产业、行业、企业、个体、区域等不同金融账户采取差异利率,更好地服务于市场需求和政府目标。

有效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一部货币史,既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又是一部国家竞争史。使用数字人民币可以跨越国家地域限制,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数字人民币能够解决传统支付系统

跨境支付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在推广上,我国数字人民币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起步,不断取得经验,扩大影响和使用覆盖面,实现数字化支付体系“换道超车”。

货币进化到今天,数字人民币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字人民币将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引擎。当然,加速提升引擎的强大动能,需要整合各方力量,既增强现有优势,又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做好顶层设计。由央行、银行、科技公司、大众等全员共同推进数字人民币的发展,找到数字人民币发展目标 and 风险对策之间平衡;确认央行、商业银行、科技公司等的权力边界,维护数字人民币安全、高效、稳定运行。

加大各方投入。建立由央行主导,产、学、研、企共同合作研发数字人民币机制,尤其鼓励科技公司参与数字人民币技术创新,加强数字人民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数字人民币应用新场景,建立自身主导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加强产业融合。不断与5G、车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相融合,在智慧城市、智慧三农、数字政务、数字教育等重点领域不断探索数字人民币应用新模式,构建数字人民币新生态。

完善监管制度。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行业的永恒主题,货币又是金融安全的第一维度。我国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已经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在与目前货币体系、金融体系融合过程中,同样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数字人民币的风险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力量,预防可能发生的金融、技术、监管等各方面风险隐患;要加快数字人民币立法,完善数字人民币的标准、相关的法律制度。

(作者分别系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湖南工业大学基地研究员)

